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上古秦汉文学史

柳存仁 著

本书分章叙述，著重于我国各种文学之发生及发展。先以上古迄汉范围为限，自何文休之产生，其发展渐有有机体之生长，往往自雏形而茁壮，而发展极盛，而渐趋颓败，以此于儒化消灭。如以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，则言诗盛于春秋，至汉代而衰颓；古文辞赋于魏晋，唐以后作者亦稀；词始于唐末五季，南宋后遂一蹶不振；小说里则独树一帜，多半模仿，竟不能求其独创之范围。此种形势，盖为历史演变之自然发展，即则以后之南北曲戏文传奇之附化，亦莫不然。故本书之所叙述者，即特别注重各体文学自民间产生又人采用以后，由长大茁壮而渐趋衰老之整个历史，而尤当说明其产生及演化之原因。

岳麓书社

民国学术文化名著

上古秦汉文学史

柳存仁 著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古秦汉文学史/柳存仁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1. 11

(民国学术文化名著丛书)

ISBN 978-7-80761-741-9

I. ①上... II. ①柳...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古代文学史—上古②中国文学—古代文学史—秦汉时代 IV. ①I209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12598 号

SHANGGU QINHAN WENXUE SHI

上古秦汉文学史

作 者:柳存仁

责任编辑:曾 倩 靳龙龙

封面设计:肖睿子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960×640 1/16

印张:9.75

印数:1—5000

ISBN 978-7-80761-741-9/G · 1028

定价:16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整理说明

一、丛书着力于“学术”与“文化”两方面，所收著作或为学术上开新之作，或为文化上奠基之作。

二、丛书之收书范围，原则上起于民国建立，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。然某些著作之成形，可追溯至民元之前若干年，因其有重要地位，亦酌情收入。

三、文、史、哲之分，原系西洋通则，本就不太适用于中国学术，故丛书不按学科分类，而是根据整理进度，顺次出版。

四、丛书所收诸书，原版均为繁体竖排，在其流布过程中，亦有版本差异、文字错讹等现象，为方便读者，此次做如下整理工作：

1. 繁体字改为通行之简体，竖排改为横排（原书中一般“右表”、“左表”、“右文”、“左文”均改为“上表”、“下表”、“上文”、“下文”），但为充分尊重原著，原书中专名（人名、地名、书名等）及其译名皆一仍其旧，凡底本脱、衍、讹、倒之处，除个别讹错明显且影响文意阅读者稍作改动外，皆一仍其旧。

2. 凡排印误刻者，如日曰、己巳巳、戊戌戌之类，均径改，不出

校记。

3. 为方便当代读者阅读，标点符号按现代汉语使用规范作了处理。

4. 丛书中多本有作者原注，原书以夹注出之，此次整理皆排入正文，并以楷体小字以为区分。

5. 各书附“后记”一篇，说明著者爵里、版本流布、各界评论等情况，以期为读者提供阅读指南。

古人云：“校书如扫落叶，旋扫旋生。”吾人虽勉力为之，而乖漏难免，还祈方家教正。

吕 序

“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何也？曰：为其渐近自然。”天下惟自然最美，人工修饰之物，总不如自然的有天趣，所以文章要贵天籁。但是自然之美，发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加以人工修饰，又是势所必至的。这个，正代表着自上古至两汉文学发展的趋势。

最古的文字，我们现在已经看不见了，或者亦可以说现在还没有发见。我们所看得见的最古的文字，大约可分为三类：一种是金石刻文，和《尚书》中真正出于古书的一部分，这是散文。一种如《老子》之类，这是口诀。一种如《诗经》中较古的一部分（诗歌的初起，其美是只在其音节的，辞句并无甚意味。而且往往三重四复，并没有说出什么话来，如《诗经》中之《芣苢》即是），这是诗歌。都是很质朴的。散文要到《战国策》，歌诀之类要到《易文言》，韵文之类要到《楚辞》，才算较为发达。（此以大体言，《诗经》中较后起的一部分，自亦包括在内。大抵《诗经》中，《风》是较元始的，《雅》《颂》是较后起的。）这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事。秦汉之世，还是循着这个趋势前进。散文如贾、晁、董、司马氏等，固然是意无尽。诗歌出于较通文墨的人的，

则由四言发展为五言；其存于农夫野老妇人孺子之口的，则为汉武帝时所采的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，后人以其机关之名称之，谓之乐府。

这时候的文章，完全是出于自然的，出口成章，并不加以修饰。然而经过一个时代，人工的修饰，就要随之而起了。这一个运动，使文字的数目，大大增加。又把一部分古语，代替了当时的言语，使言文渐渐分离。这一个运动，把文字的内容扩大了，却使其趣味减少。

秦汉时代的字书，我们所知道的，有李斯所作的《仓颉篇》，赵高所作的《爰历篇》，胡毋敬所作的《博学篇》，合计三千三百字（其中本有复字，后已被扬雄换去）。扬雄所作的《训纂篇》，二千四十字。班固所作的《十三章》，七百三十二字，合计六千七十二字。现存的《说文解字》，则其都数为九千三百十三，可见字数的逐渐增加。这种增加的字，果何从而来呢？我们试看东汉、魏、晋时崇尚古文学的人，每每訾议人家不识古字，如《尚书·伪孔安国传序》说：“科斗书废已久，时人无能知者。”这固然是野言，然其说亦必有所本。篆隶之异，只是笔画形状，识隶书的人，断无不识篆书之理。然则所谓时人不识古文者，与其说是字体的改变，还不如说有许多废而不用之字，又给好古的人去搬出来了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：元始中，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，各令记字于庭中，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《训纂篇》；而《扬雄传》说：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。所谓有用，就是日常使用的，所谓奇字，就是不甚行用的，如现今所谓业经死去的文字了。这许多字，给做文章喜欢博洽和生僻的人，又统统搬了出来。然而还不止此。《三国吴志·虞翻传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说：孙亮时，有山阴朱育，少好奇字。凡所特达，依体象类，造作异字，千名以上。可见当时好奇字的人，还有自造新字的。（当时好辞赋者，多称其能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此等名词中，必多新造之字。）把已废不用的古字，通通搬了出来，再加以自己之所造作，其所做的文章中，人家不认得的字，自然多了。我们现在读汉赋，生僻的字极多，就是为此。这种趋势，在做文章的人，除使人震惊其博洽，及

感觉一种生僻之趣外，并无别种意味。

还有一种，便是所谓尔雅运动。雅与夏即系一字。大概古代音读之殊，以楚夏为两大宗，亦即如今南北方言之异。因文明程度的高低，在古代的趋势上，早就以夏言为正。所以《论语》上说“子所雅言，诗、书、执礼”，而孟子讥许行为“南蛮鴟舌之人”。然而到汉代，所谓尔雅者，已非复近于夏言之谓，而为合于古语之意。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说：“诏书律令下者，明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义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，恩施甚美，小吏浅闻，不能究宣，无以明布谕下。”《史记·乐书》说：“今上即位，作十九章，通一经之士，不能独知其辞，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诵讲习之，乃能通知其意，多尔雅之文。”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莽颂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，“其文尔雅依托，皆为作说”。这所谓尔雅，明明都是近古之义。雅字何缘有古字之义呢？颜师古说：“尔雅，近正也。”盖初以雅言为正，而雅字遂引伸而有正字之义，其后改以古语为正，尔雅之义，就从近正变为近古了。在此趋势之下，修辞造句，都可以古为准，不顾其与口语合否，不但不以之自谦，而且还以之自矜，而言文遂渐渐分离。

言文的分离，和作文好用冷僻之字，不过使人见了觉得有一种新奇之感。顺此趋势，遂有造句亦务求其特别的。譬如扬雄《谏止哀帝拒绝乌珠留单于来朝书》说：“往时尝屠大宛之城，蹈乌桓之垒，探姑缯之壁，借荡姐之场，艾朝鲜之旃，拔两越之旗，近不过旬月之役，远不离二时之劳，固已犁其庭，扫其闾，郡县而置之，云彻席卷，后无余藟。唯北狄为不然，真中国之坚敌也。三垂比之县矣，前世重之兹甚，未易可轻也。”此中屠城，蹈垒，探壁，借场，艾旃，拔旗，句句变换，以及犁庭，扫闾，云彻，席卷等，都是有意选用的新奇可喜，富于刺激性的字眼，而句调亦极整饬，这都是有意为之的。这种文字，在当时大约惟懂得小学，而又擅长辞赋的人，乃能为之，“达而已矣”的文学家，都不能为。我们读此等文字，亦未尝不激赏其组织的精能，极人工修饰

之美，然而比诸冲口而出，纯任自然的文字，总还觉得其天趣的不如。文章最精微之处，在于声调。声调之美，无过于太史公，这大约是讲旧文学的人，十之八九，可以承认的。太史公的文章，声调之美，原因何在呢？我敢说全在其基于口语。我们读古书，觉得在先秦时代，句子的冗长，无过于《墨子》，在两汉时代，则无过于《史记》（足与《史记》并称的，其实不少。如王充《论衡》，其辞句亦甚冗蔓）。《墨子》书句子的所以冗长，即因其上说下教，只求人之易解，而不求其美丽之故。《史记》句子之冗长，是人人所知，其实已经钞写的人删节过了。真正《史记》的原文，比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还要冗长一些，试看《史通·点烦篇》所引可知。史公文字句子的冗长，无疑的，乃由其按照当时的口语写出。此等文字，在言文业经分离，行文力求简洁之世，文学家怕多数觉得其该删改的，不过拘于尊古的习惯，少有人敢继刘知幾之后而言点烦罢了。然而文章笔调最美的，却亦出于《史记》之中。试看《太史公自序》：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年十岁则诵古文。二十而南游江、淮，上会稽，探禹穴，窥九疑，浮于沅、湘，北涉汶、泗，讲业齐鲁之都，观孔子之遗风，乡射邹峰，厄困鄱、薛、彭城，过梁、楚以归。于是迁仕为郎中，奉使西征巴、蜀以南，南略印、笮、昆明，还报命。是岁，天子始建汉家之封，而太史公留滞周南，不得与从事，故发愤，且卒，而子迁适使反，见父于河、洛之间。”此中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一句，崔觐甫《史记探原》疑为后人窜入，我亦颇有同感。今即置此等考据问题于弗论，而这许多句子之中，除“年十岁则诵古文”，“于是迁仕为郎中”，“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”，“故发愤且卒”数语而外，无一不有地名。使有意于做文章之人之为之，其声调岂复可诵？即使勉强做到可诵，亦至多不至于棘口，要求诵之而觉其和谐宛转，必不可能了。而太史公却能之。此岂其别有缪巧，不过即本于当时的口语罢了。无论那一种语言，都有其自然的声调，自然的声调，无不和谐宛转，曲尽其妙，为学做文章的人穷老尽气所不能至，此即所谓天籁，此即所谓自

然，为人工修饰所万不能及。现在守旧的人，极力反对语体文字，而不知其所认为最美，奉为典型，终身学之而不能至的，正即若干年前的语体文字；而现在的语体文字，过若干年后，其中精美的，亦必为后人所欣赏，一如吾侪今日之于先秦两汉之书（但鄙倍者除去。此则古文中亦有鄙倍者，不独白话也）。虽事非吾侪所能见，而理却可以预决的了。

然当时的人，读了此等文字，不过如我们今日之视语体文字，或者浅近文言，并不觉其如何美妙，而其所视为美妙的，倒是加以人工修饰，使之与自然相远的。于是用字务求新奇，造句务求齐整，遂渐形成汉、魏时代的骈文了。骈文初兴之时，去口语尚不甚远，未至完全不适于用。到后来愈离愈远，不但不适实用，而且其所谓美者，亦实在觉得索然了。于是又有所谓划除浮靡的运动，而韩退之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。上古时代，文学渐次萌芽，到东周西汉之世而达于极盛。其时人工修饰之弊渐兴，亦即自然之文体渐坏。至文体之坏达于极点，而文学上之所谓美者亦全亡，只剩些人工修饰的部分，索然无生气了。自上古至南北朝之末，文学的变迁，实具有佛法上成、住、坏、空四种相，而先秦两汉的文学史，该括著其中的前三种。

此时期的文学史，是非在文学上有相当修养的人不能做的。不懂旧文学不好，不懂新文学又不好。而且讲到此时的文学，非略通古书义例不可，这又是不能不懂得考据的。要这三方面兼擅之才，却真不易得了。而这一部书就是其书。内容读后自然见得，无烦我的征引了。

三十年一月五日于孤岛，武进吕思勉。

自序

《上古秦汉文学史》凡七章，章之篇幅长短，因材料内容之繁简而异，凡所举例引证，皆并世学者主张，择其善者而从之。故其时代虽自有约限，而自纂述之日迄于完成，亦已两历寒暑。各章文字，先后在光华大学及太炎文学院印为讲章，教授诸生，并承吕诚之先生赐长序，定书名，弥觉珍感。凡所援征，大率以胡適之，顾颉刚，傅孟真，容元胎四先生所说为最多，“诗三百篇”及“春秋战国”二章例证，皆適之先生所选，迄今未见露布者，复承顾容两先生鼓励印行。书成之岁，余移居香港，治西洋汉学，謁林语堂，许地山，容元胎，陈寅恪，袁守和诸先生，颇加策许，拟更自译此书为西文，今乃先于此谢之。

中华民国二十九年腊月，存仁自记。

目 录

吕 序	1
自 序	6
第一章 绪 言	1
第二章 中国文学之起原	7
第三章 诗三百篇	28
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	64
第五章 楚 辞	99
第六章 荀卿制作与赋体之完成	111
第七章 汉代之民歌	127
后 记	143

第一章 绪 言

文学一词之解释，在古籍中所称引者，与吾人今日所习闻而正确之文学观念，未能尽相符合。考文学二字最早见于载籍者，厥为《论语》“文学子游子夏”（《先进》）。“文”字据马融注，指为“古之遗文”，同书又有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”之语，则文学为诗书礼乐，同于典籍文献。《墨子》言“今孔子博于诗书，察于礼乐，详于万物”（《公孟》），《荀子》谓“子赣，季路，故鄙人也，被文学，服礼义，为天下列士”（《大略》），而《韩非》复云：“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”（《问辩》），均可为先秦时代指文学为博学与文献之证。迨及两汉，更以文学泛指一切学术而言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记武帝时官迁留滞，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者，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，比百石以下，补郡太守卒史，先用诵多者。此一艺盖指一经言。诵经书者众，当时即美之为“公卿大夫士吏，彬彬多文学之士”。故其时之文学观念，实与学术相淆混而不可分辨。魏晋而后，风气略有改变。有倡言文学应自有其特殊之范畴，而与“玄”“儒”“史”分称四科者，自宋文帝始。其前，则范曄《后汉书·文苑传赞》、陆机《文赋》已肇其端。

其后，则梁昭明太子萧统亦尝举“赞论之综辑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者，为其纂辑《文选》一书之纲领。尝云“词人才子，则名溢于缥囊；飞文染翰，则卷盈乎绡帙”（《文选序》）。此一时期之文学，虽极倾向于骈俪绮靡，穷妍辞藻之一途，然衡以今日之文学观念，亦渐相类似。吾人固非主张文学专以堆砌藻饰为务者，然文以明道或载道之说，究未能包罗文学之全体。北宋周敦颐为理学之开创大师，尝谓“文，所以载道也。不知务道德，而第以文辞为能者，艺焉而已”（《通书》），苟细研其意，可知其非绝对排斥美文之作用，惟讥当时俗文之过于褻积故实雕绘语句者，无裨于实用而已。故其心目中的文学观念，亦必与学术殊指，有承认“文辞”“文艺”之倾向；此则认识甚清，较之汉儒以“明天人分际，通古今之谊，文章尔雅，训辞深厚”（《汉书·儒林传》）为文学者，其思想之进步亦区以别矣。清儒顾炎武固痛斥文人求古之病者，谓“夫今之不能为二汉，犹二汉之不能为《尚书》《左氏》。乃剿取《史》《汉》中文法以为古，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，于文殊为不称”（《日知录》卷十九）。又云：“《三百篇》之不能不降而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之不能不降而汉魏，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，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，势也。”（同书卷二十一）其时代观念认识之透澈，贤于当时诸儒远甚，然仍主张“无关于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”，而谓“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，若但作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争臣论》《平淮西碑》《张中丞传后序》诸篇，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，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，今犹未敢许也”（《与人书》十八），则载道之言，实为一般学者矫枉过正之通弊，未可持其一端而议论其对文学认识之全体也。挽近则章炳麟云：“文学者，以有文字著于竹帛，故谓之文，论其法式，谓之文学”，其说未免过于广泛。然又云“凡云文者，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。故有成句读文，有不成句读文，兼此二事，通谓之文。局就有句读者，谓之文辞。诸不成句读者，表谱之体，旁行邪上，条件相分，会计则有簿录，算术则有演草，地图则有名字，不足以启人思，亦

又无以增感，此不得言文辞”（《国故论衡》中，《文学总略》），则文学亦必属诸启人思增感情者，彰彰明甚。

西文之释“文学”，最早盖源出于拉丁语之 *Litera*，衍变而成 *Literature* 一字，实含有文字文法及文学等三种意义。近来西人著述中对文学所下之定义，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，而采用狭义者较多。如美国韩德氏（Hunt）于其所著《文学原理及其问题》中，阐述其个人对文学之解释为：“文学为思想之文字表现，借想像感情与趣味为之媒介，使人易于理解及发生兴味，而复出于并非专门之形式。”此种解释最为平易而正确，常为各国书籍中所采用。综合其定义中所列举之文学要素，则（一）想像、（二）情绪、（三）思想、（四）形式四者，不可缺一。故优美之文学作品，亦必以启人思智增人情感为能事，此盖中外通儒所论者，体要大致相同，实不偏不倚之论也。

以上所述为“文学”之解释，而“历史”二字之解释，亦复有新旧说之不同。吾国旧说以为历史者，推往古观未来者也，故其所重视者，为兴亡盛衰循环不断之因果关系。今说则于探索历史之因果关系而外，复着重于各时代社会现象之考断与说明。最初发生历史之形式，无非为对一区域一民族一国家过去生活现象及社会状态之纪载，不复加以论证及解释。其后，史家乃渐能分析其事迹之异点及特征，而为将来研求其他事迹或问题之根据。更进则着重演进之历史过程诸情态之变化，及各种事迹之因果关系，与夫一事迹对其地方性、民族性或国家性之影响。此以前历史学逐渐进步之程序也，而更新之史学家所希冀之新历史观念，复有异于是。如鲁滨孙氏（James Harvey Robinson）于所著《人类之剧》（*The Human Comedy*）中，提倡研究及发育历史之心理，即多与前人论列有所不同。根据其所主张之学说，则吾人所当研求之新历史，已非朝代兴亡、帝王废立、战争成败之记载，亦不仅为一国家一民族一朝代之叙述。此种新历史之对象，既不以民族国家为界限，故常依全人类之生活活动区域为其范畴。复以吾人所习知之有史时期为时至短，而

人类在地球上之历史实逾五十万年，故亦不能以吾人旧日所划分之所谓时期为研究之对象。此外则此种新历史置重于推求文化演变之迹，追索事物进化之来历，及研究社会现象之真相，使历史成为一和谐体，而熔过去现在将来于一炉。此种新历史之共同趋向，据歉纳氏（Edward P. Cheyney）所列举之历史定律，实包括（一）历史延续性、（二）民族国家之变更、（三）人类之普遍和谐与相成、（四）人类之趋向民治、（五）自由范围之扩张、（六）人类暴虐心之减少与同情心仁爱心之扩张六项。因其较现在已有之历史学为更进一步之追究，重在研究现存之人类信念风俗习惯等之来源，俾能寻求更精确之历史规律，故实为历史学上之一大贡献。惟此种新历史学，在今日尚处萌芽时期，未臻成熟，故吾人研究历史，虽以此种新趋向为共同努力之目标，然在此过渡之时期，吾人所纪叙之历史，仍以纪载过去所发生事物之真相、原因，及影响三者为必不可少之鹄的。

根据上述对于历史之解释，可知文学史应为历史之一部分，而以叙述各时代文学之演变为其原则。坊间所流行之文学史，多仅罗列各时代作家之姓名，而略不叙及其个性环境、作品内容，有类辞典，直《录鬼簿》之不若。不知文学既为生活之表现，且为演进中之活动历史，故文学史之作，不惟对于文学作者之个人生活须有精细之探讨，即对于产生某一时期文学之时代精神，社会环境，文化氛围，亦应有确切之认识，再依据事实认识而考察其所发生之影响。根据上述之原则，吾人今更可缕述文学史之任务如次：第一，文学史宜特别注意各时代文学演变或交替之痕迹，原因，及其影响。第二，文学史宜详叙作家之个性环境及生活全貌，与其作品成就之关系。第三，文学史宜研究文学作品之本身，并介绍优美作品，以供学者之欣赏与参考。

吾国旧无文学专文，正史中与文学史有关者为《艺文志》（如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），《儒林传》（如《汉书·儒林传》等），《文苑传》（如《后汉书》《晋书》等），《文学传》（如齐、梁、

陈《书》《南史》等)，《文艺传》（如《新唐书》《金史》等），或为文学典籍之纪载，或为文学家之传记，仅足为著述新文学史参考之资料。史书而外，如诗文评述，诗文集序，文话诗话词话，以及笔记考订杂纂之属，亦时与文学史有密切之关系。西汉末刘歆作《七略》，有《诗赋略》，为议论纯文学最早之叙述。然其书早佚（后世颇有辑本，不全）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即源本《七略》加以删节而成。《汉志》分诗赋之类为五，复从历史演变上而略叙其变迁之大势曰：“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，当揖让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。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……春秋之后，周道寢坏，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。学《诗》之士，逸在布衣，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。”读此可略窥《诗赋略》之性质。魏晋六朝间有挚虞之《文章流别志论》（已佚，后世亦有辑本），刘勰之《文心雕龙》，钟嵘之《诗品》，以及依托任昉所作之《文章缘起》，并唐宋以后诸相类似之书籍，均约略近于文学史之性质，而体裁容有繁简异同。迟至清季光绪二十七年（公元一九零一），英人翟理斯氏（Herbert A. Giles）所著之《中国文学史》（*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*）始告出版，其书用英文写成，内容荒谬错误之处，出人意外者极多；日本笹川种郎之《支那文学史》亦几于同时问世（日本博文馆《帝国百科全书》本），而国人自著之本，仍未出现。复后三年（光绪三十年），北京优级师范馆教习林传甲始著《中国文学史》成，是为国人自著文学史之嚆矢。又二年，窦警凡亦著成《历朝文学史》（日本东京弘文堂印行）。其书以今日之眼光读之，亦皆芜杂不堪。民国以来，文学史之著作风起云涌，除通史性质者外，更多分体或断代史之著作。据个人见闻统计所及，至民国二十四年止，为数已有七十四种。

本书分章叙述，着重于我国各种文学之发生及发展，先以上古迄汉范围为限。任何文体之产生，其发展常如有机体之生长，往往自雏形而茁壮，而发展极盛，而渐老渐衰，以迄于僵化消灭。如以整个中国文学史证之，四言诗盛于春秋，至汉代而衰颓；五言诗成于魏晋，唐以后作